

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成就可谓有目共睹。国民党溃逃台湾后总结失败教训,往往不承认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,倒是接受了情报之败,可见这一领域的失误给他们留下深刻烙印。

我党情报战线的成长,和革命斗争需要密切相关。1927年4月12日,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,猝不及防的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,后来反思检讨,没有及时的情报预警是一大教训,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借鉴苏联经验,于同年5月在汉口成立“特务工作处(科)”,下设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、政治情报,加强情报保卫。这就是我党情报部门的雏形。两个月后,周恩来奔赴南昌领导暴动,汉口特务处工作实际上停顿了。11月上旬,周恩来调回上海,主持中央军事部工作,决定新设特别事务科(即“中央特科”),下辖一科(主管总务)、二科(主管情报)和行动队(又称“红色保卫队”,简称“红队”)。不久,特务科调整为总务(一科)、情报(二科)、行动(三科)、无线电通讯(四科)和红队(归三科指挥),基本任务除了保证中央领导机关安全,收集掌握情报、建立秘密电台成了重中之重,这被视为我党第一次专业情报保卫体制的转型与升级。

抗战爆发后,1937年12月,党成立“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”(简称“特委”),对外称“敌区工作委员会”,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。1939年2月18日,党中央成立中央社会部,负责根据地锄奸肃特,并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保卫性情报工作。1941年初,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,偷袭新四军,这再次提醒中共:必须预防突然袭击,将原来侧重报警性和保卫性的情报工作转为军政战略性情报工作,由零星的情报搜集变为周密系统的情报分析。为此,1941年9月,党中央合并中央社会部与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机关,组建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统一领导的中央情报部,标志我党情报工作实现由“守”转“攻”的战略转变。

这次转型和升级非常成功,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评价,“在抗战以前,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,我们都清清楚楚”,但此次“共产党这一套新的战术,带给我们无穷的困扰”。这一时期,我党较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,制定独具特色的情报工作方针、政策和做法,有力地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,经受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艰险复杂形势下的锻炼和考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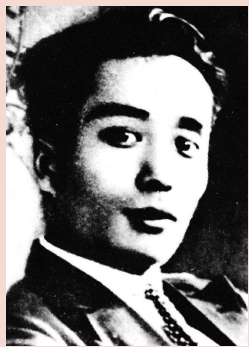
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后,中央军委成立直轄的情报部。至此,党的情报工作采取中共中央情报部和中央军委情报部双轨形式开展,完成了第三次转型和升级。这次转型是主动进行的,进而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许多至关重要的贡献。毛泽东曾高度评价:解放战争时期“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”。



红色秘密战

革命年代的我党情报工作

◆ 马沈



■ 钱壮飞



■ 在1949年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中,地下党发挥了巨大作用

出色的战绩

在不同时期,我党情报工作亮点纷呈,被誉为“一次次改写了历史”。

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假左派汪精卫企图在武汉搞叛变时,由于汉口特务处提前掌握敌人动向,使党中央避开敌人的突袭,为发动南昌起义保存了力量。其后,中央特科获取的蒋介石亲自策划“围剿”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情报,为红军取得第一、二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。最为人所称道的是,1931年4月,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,两个月后,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,千钧一发之际,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截获国民党数封急电,并及时向党中央汇报,成功安排白区的党中央“火线大转移”。

抗战期间,我党不仅要反击日寇残酷的“大扫荡”,还要提防国民党频繁发起的反共高潮。1943年7月,党的情报部门及时掌握国民党胡宗南部企图“闪击”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,党中央反其道而行之,先是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,抗议他们的挑衅,接着召开3万人的紧急动员大会,揭露国民党阴谋,并通电全国,呼吁停止内战。本来胡宗南进犯边区是要“攻其不备”,但在事实都被公开后已无“奇”可言,只好黯然收兵。1944年,党领导的东北抗联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境的布防机密,后在关键时刻提供给苏军,为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解放战争中,党的情报工作更是出神入

化。1946年3月,蒋介石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,策划半年内击溃中共军队,还确定军事部署细节,这些战略情报都被迅速送到延安。相当一段时间,蒋介石从最高参谋机构“国民政府参军处”得到的材料,中共中央军委几乎能同步看到。1946年苏中战役,国民党李默庵部在7月9日才下达的作战计划,我军第二天就全部知晓。1947年,蒋介石紧急召集军事会议,确定围堵渡过黄河的刘邓大军的作战方案,可相关情报还是传到中共方面。1948年夏秋开始的三大战役中,南京国民党的国防部刚拟定的作战计划,常常被地下党迅即送达中央军委处并被发往相关战略方向的总部,为夺取大决战胜利发挥重要作用。



■ 机智英勇的我军侦察兵



■ 1948年打响的辽沈战役中,地下党情报工作极为出色

